

---

# 民初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之权力分配格局再认识

徐立刚<sup>\*1</sup>

**【摘要】**:在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共同推动辛亥革命进程的新旧交替之际,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在形式上注意团结容纳革命阵营内部多方力量,实质上让权力集中于同盟会,某种程度排斥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甚至革命党人中的不同派别者。孙中山等以为临时政府权力集中于同盟会、甚至较多地集中于孙中山才有利于革命,结果造成革命阵营内部多方力量与同盟会、临时政府疏远甚至对立,削弱了临时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执政效果。

**【关键词】**:孙中山; 南京临时政府; 权力; 集中; 同盟会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7)05-0150-07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7.05.021

辛亥革命中在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意义非同凡响,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对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的权力分配作再认识,因为这一问题深刻影响了当时革命阵营内部多方力量之间关系、南京临时政府生存状况。

关于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的权力分配,早先曾有论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下册认为,让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进入南京临时政府,对于辛亥革命事业很有损害。<sup>[1]</sup>后来的论著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分配往往予以正面评价,认为既保证了同盟会对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又注意团结容纳了革命阵营内部多方力量,如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sup>[2]</sup>胡绳武、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革命的成功与失败》。<sup>[3]</sup>也有论著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分配在肯定之余有所批评,认为没有妥善吸纳革命阵营内多方力量,主要是对湖北革命党人重视不够,如茅家琦等人的《孙中山评传》,<sup>[4]</sup>张宪文、薛恒等人的《共和肇始:南京临时政府研究》。<sup>[5]</sup>至于当时引起风波的孙中山将伍廷芳、王宠惠职务对换,有些论著予以肯定,如吴佩林、董清平的《王宠惠何以担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sup>[6]</sup>刘宝东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组阁风波》,<sup>[7]</sup>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下册。<sup>[8]</sup>而张礼恒的《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则认为孙中山所言理由显然并不能令人信服。<sup>[9]</sup>

笔者经过深入解读史料,重新探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的权力分配格局,认为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的权力分配存在着较大缺陷,即形式上注意团结容纳革命阵营内部多方力量,实质上还是让临时政府权力集中于同盟会,某种程度上排斥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甚至于革命党人中的不同派别者——同盟会以外的湖北革命党人及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在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共同推动辛亥革命进程的新旧交替之际,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以为临时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同盟会、甚至较多地集中于孙中山才有利于革命,结果权力分配失衡、用人错位,导致革命阵营内部多方力量纷纷与同盟会、临时政府疏远甚至

---

<sup>1</sup> 作者简介:徐立刚,江苏省档案馆研究馆员 南京 210008

---

对立,人心离散,削弱了临时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执政效果。

## 一、孙中山组建临时政府时权力分配的思想基础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国外抵达香港,胡汉民前来力劝孙中山暂留广东,整兵蓄势而后北伐以收全局之功,反对孙中山立即北上沪宁。孙中山认为当时南北对立状况愈拖延则对革命愈不利,他说服了胡汉民,并且以舍我其谁的自信对胡汉民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sup>[10]</sup>

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后,26日即与同盟会的一些重要人物讨论如何筹建临时政府。孙中山希望自己这受到独立省份共同认可的人,日后在临时政府中拥有较大的实际权力,以便实施自己的革命主张,不误革命大计,故而反对临时政府实行内阁制。

12月27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简称各省代表会)的代表马君武等,商谈组织临时政府问题时,要求自己作为临时政府领导人在名义上无所保留,“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sup>[11]</sup>有代表事后回忆对孙中山的观感:“当时感到惊异的是先生的语气真挚亢爽,直截了当,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慨,一洗中国缙绅虚伪谦逊、矫揉造作之态,虽细微处,亦见伟大。”<sup>[12]</sup>

从坚持迅速北上出面组建中央政府,到反对实行内阁制,再到要求就任正式大总统,孙中山出于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自信,当仁不让,并力图强化自己在政府中的权力,以求充分实施自己的革命主张。这些是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进行权力分配的思想基础。

## 二、临时政府组建中权力的博弈与失衡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着手组建政府。“总统就职翌日,代表会开会,总统出席。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各部长由总统提出,须得代表会之同意,先由代表开谈话会,总统交出部长名单,交换意见。当时初提黄兴陆军、黄钟瑛海军、王宠惠外交、宋教仁内政、陈锦涛财政、伍廷芳司法、汤寿潜交通、张謇实业、章炳麟教育。代表中有一派反宋教仁、王宠惠、章炳麟者,又有以伍廷芳改外交者,争持不决。”<sup>[13]</sup>

武昌起义之后,出现的十几省反清独立的形势,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共同推进辛亥革命进程而形成的。宋教仁(字遁初)出于政党内阁的政治理念,却提出由革命党人包揽南京临时政府权力。“以遁初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对于这种很偏激、不合时宜的想法,在1912年1月2日,黄兴居然认为“理由甚充足。”黄兴即刻又与孙中山商量采取变通办法:“但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遁初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sup>[14]</sup>孙中山“派黄兴为代表,将全体名单撤回,再提第二次名单”。<sup>[15]</sup>

1912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通过了南京临时政府九个部的人选:“陆军部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总长黄钟瑛,次长汤寿潜;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謇],次长马君达[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sup>[16]</sup>“部长只陆军、外交、教育为同盟会党员;余则清末大官,新同情于革命者也。”<sup>[17]</sup>

不过,由于临时政府设计为“部长取名”,立宪派、旧官僚出身的总长(即部长)大多并无实权,也没有推荐任命本部的次长的提名权。随后,“乃本诸初议,次长必用同志,不必由总长推荐,虽是到任总长,亦不能例外。”<sup>[18]</sup>因临时政府设计为“次长取实”,“惟次长

悉为党员”，<sup>[19]</sup>而且除海军部的次长汤芑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骨干分子，所以临时政府权力还是集中于同盟会。

先前为了反清革命成功，也为了争取在临时中央政府中拥有尽量多的权力或者影响力，江浙的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对于建立南方的临时中央政府充满热情。但在“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南京临时政府组建过程中，被任命为总长的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态度由积极转而表现为消极。薛仙舟当时对蔡元培说：“此次组阁，除君与王君亮畴外，而同盟会老同志居次长地位，各部均以名流任总长，但名流尚观望不前”。<sup>[20]</sup>居正记载：“……各部总长，旧时大官名流，多持观望，不肯接任。”<sup>[21]</sup>这些总长很快索性让同盟会去唱独脚戏。“然张、汤仅一度就职，与参列各部会议，即出住上海租界。程固于租界卧病。伍以议和代表，不能管部务。陈日经营借款，亦常居租界。故五部悉由次长代理，部长之负责者，黄、王、蔡耳。”<sup>[22]</sup>因此临时政府被当时人们称为“次长内阁”。

张謇先是有意避开担任财政部总长这一难事。他在1911年12月给赵凤昌的信中流露：“近日各代表团所拟临时政府行政大纲，略分五部。财政部若兼生财、理财为一，似未妥善。此时举措，关系全国安危，人人在与安与危之中。下走苟能尽力，岂有所爱？但熟察情势，则担任一事，或任财政中之生财一面，犹或可勉强一时，共襄支柱。若兼任理财之名，则是牺牲一身而无益大局”。<sup>[23]</sup>即使避难就易地担任了实业部总长，张謇仍是态度十分消极。他在1912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被推为实业部总长。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第二天，临时大总统召见，张謇日记又记：“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sup>[24]</sup>后来张謇在1912年3月给实业部次长马君武的信中表露，这实业部总长他也不愿意干多久：“下走被任实业之始，即与中山先生面订短期。受状之日，复具书坚约。”<sup>[25]</sup>当时汤寿潜卸掉了浙江都督一职，仍不愿就任交通部总长。程德全的江苏都督一职已由庄蕴宽代理，内务部总长之职也不就任。似乎还有总长表达不满，“伍廷芳来京就职，却将印携回上海，不视事，经吕次长往返说明，始交出”。<sup>[26]</sup>

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的权力分配中，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在临时政府里是有名无实，他们对同盟会、临时政府的态度变得消极、疏远；而湖北非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干脆被排斥在临时政府之外，他们对同盟会、临时政府的态度则是变得对立。

武昌起义之前的多年里，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先后在内地和沿海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不下于十几次，全都失败。湖北不属于同盟会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埋头苦干多年，潜心发展革命力量，终于时机成熟，举事成功，天下响应。武昌首义诸人当然很有自豪感，凭其能力和功劳也应当在南京临时政府内有相应的位置。后来任湖北参议员的原同盟会员刘成禺、时功玖曾为此劝说孙中山，“说孙公宜宠异武昌诸将，勿令怨望。”<sup>[27]</sup>却没有效果。发动武昌首义的湖北革命党领导人无一成为临时政府部门总长，连个次长都没有；仅一个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位置，留给旧官僚出身的武昌首义名义上的领导人、后来夺得湖北军政府大权的黎元洪。临时政府九位次长里面，湖北籍的倒是不少，有蒋作宾、汤芑铭、王鸿猷、魏宸组、居正，达五名之多，但都是同盟会内部的人，对于团结同盟会以外的湖北革命党人无甚意义。让汤芑铭担任海军部次长非但未能给临时政府加分，反而增添了负面影响。汤芑铭当初留学法国、英国，“曾经在孙中山访法时，在巴黎孙中山的下榻处，偷割孙中山的皮包窃取文件，向清驻巴黎的公使孙宝琦邀功请赏。名单公布后，欧洲归国留学生哗然。”<sup>[28]</sup>

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选人用人，黄兴（字克强）的意见举足轻重。孙中山刚从海外归国，对国内具体情况一时难以掌握，人事安排多与黄兴商量决定。同盟会以外的湖北革命党人与黄兴原先有所不和。章太炎说：“初，克强在汉阳，视武昌诸将蔑如也。其义故浅躁者，欲因推克强为都督以代黎公，未果。及汉阳败，克强窜上海，武昌诸将甚恨之，然未尝怨孙公也。孙公初返国，不晓情伪。”<sup>[29]</sup>于右任说：“惟当时武汉对克强不好，克强亦厌恶武汉数人”。武昌首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孙武（字尧卿）亲自到南京活动，欲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谋取陆军部次长一职，但因为曾与黄兴不和，至上海又“态度殊惹人厌，英士更表示反对，竟以各部次长予海外归国同志，而在武汉首义者反未顾及”。<sup>[30]</sup>“南京临时政府对武汉起义功臣中唯一安排的是汤化龙。汤化龙先任法制局副局长，后任陆军部秘书长。但汤化龙的安排一来位置不算高，较之次长还低一个级别；二来汤化龙自阳夏之战后因不满自己从政事部长贬为没有实权的编辑部长，所以追随黄兴离鄂赴沪，被武昌集团视为‘逃官’，与武昌集团已有嫌隙，根本不能代表武汉方面。”<sup>[31]</sup>汤化龙是原湖北咨议局局长，汤芑铭之兄。

---

南京临时政府组建后，“武汉方面以鄂人未获任总长，颇为不满”。<sup>[32]</sup>章太炎回忆说：“孙尧卿至南京，不用。时黎公已被副选，诸将请仍称大元帅。移书南京，称汤化龙湖北逃官，不当任用。两府之怨，自此起矣。”<sup>[33]</sup>后来湖北军政府在国旗、财政等方面对南京临时政府闹独立性。湖北军政府中还有孙发绪煽动：“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多材，应另树一帜，以与之相抗。”<sup>[34]</sup>1912年1月16日，孙武、刘成禺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民社。民社的基本态度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sup>[35]</sup>

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未能坚持团结吸纳同盟会元老、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使得章太炎跟临时政府更加疏远，这也给临时政府带来不少麻烦。

章太炎(名炳麟)满腹经纶，是一位学者型的坚定的革命家，时常言行偏激怪异，但不乏真知灼见。章太炎曾在同盟会内部两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1910年他与陶成章重建光复会，跟孙中山、同盟会一直很不和睦，武昌起义后出于偏见和误解，他又反对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

1911年12月2日，章太炎在给谭人凤等人的复电中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sup>[36]</sup>章太炎反对“以一党组织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直接的用意只在以‘革命军’划线，打破、消除原革命党、立宪派等之间的界限，即如《大公报》登载章氏复电的标题所示：‘消弭党见’。”<sup>[37]</sup>“是希望将已光复的各省军政府，不分他们的成员原先属于什么派别，都尽可能广泛地联合起来，共同组建临时中央政权。”<sup>[38]</sup>然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被有些人理解为在完成革命历史使命之前，要过早将同盟会改组为政党，过早取消同盟会的名号。12月30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对章太炎激烈批评说：“而吾党偏怯者流，乃唱为‘革命事起，革命党消’之言，公然登诸报纸，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瞽之，是儒生閤茸之言，无一察之值。”<sup>[39]</sup>

章太炎与孙中山、同盟会的关系既然如此，各省代表会中自然有些代表反对章太炎担任教育总长。1月2日，黄兴与孙中山商量：“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对于换掉章太炎、宋教仁，孙中山当即答应：“内教两部依兄议”，没有试图挽回。<sup>[40]</sup>

1912年1月3日，章太炎正式宣布退出同盟会，创立中国民国联合会。1月12日，孙中山在给蔡元培的复信中谈到组建政府的原则以及对章太炎的尊重。1月14日，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被刺。“陶成章和其他一些光复会重要成员惨遭杀害后，为制止仇杀辄辍光复会之风，缓和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冲突，孙中山于1912年2月6日特别聘请章炳麟为枢密顾问。”但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关系已经到难以挽回的地步了，章太炎不便推却任命，就借口上海与南京距离很近，有事便于告知，“第二天便离宁返沪，继续保持他站在民间立场督察中华民国建设的特殊地位。”<sup>[41]</sup>章太炎与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权力分配上更是理念不合，1912年2月，章太炎在《参议员论》中说：“及南京政府既设，一党专制”。<sup>[42]</sup>

章太炎被排除在南京临时政府要职之外，不能身在其中而体验、理解临时政府的为难之处，拉大了他与同盟会、临时政府的心理距离。“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章炳麟处于权力中枢之外。临时政府新创，许多事不得不从权处理，特别是在革命仍在继续、政权方才初创时期，不可能从一开始便处处合乎规范。章炳麟所选定的批评与监督角色地位，同南京临时政府的实际政治运作便免不了要经常扞牾。”<sup>[43]</sup>章太炎屡屡批评临时政府，在筹措外债、定都南京等问题上，时常弄得临时政府很是被动、难堪。

### 三、孙中山在临时政府中用人错位与失当

南京临时政府的总长、次长大多是相关方面的行家，但孙中山对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心存疑虑，用人错位，任非

---

所长,引起社会反弹,又造成不利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所面临的重大困难之一,为财政问题。黄兴对此认识最深,曾建议孙中山请张謇担任财政总长,俾便筹得财源。由于革命党中有人反对,同时张謇本人亦无意斯职,终于转而出长实业部。”<sup>[44]</sup>这反对者至少有孙中山。胡汉民回忆:“克强推荐张謇或熊希龄长财政,先生不可,曰:‘财政不能授他派人,我知澜生不敢有异同,且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于是用陈。”<sup>[45]</sup>

张謇的确是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的合适人选,因为他是实业家,自身拥有财力,在金融界、商界人脉又广,有理财能力和条件,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张謇没有当财政总长,“但他在财务方面仍尽力不少。”<sup>[46]</sup>熊希龄也具有财政经济方面的才能,曾应孙中山、黄兴之邀,为其草拟过财政方面的纲要。孙中山因张謇、熊希龄原属立宪派,是“他派人”,便不放心,而改用“不敢有异同”的陈锦涛(字澜生)

虽然组建政府时让张謇不当财政部总长、转任实业部总长得以顺利实现,不过孙中山让伍廷芳、王宠惠职务对换却造成一场风波。

孙中山向各省代表会提出的政府人选名单中,31岁的法学专家王宠惠任外交部总长,而晚清退休官员、外交专家伍廷芳任司法部总长,有些代表对此反对。孙中山与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交往颇深。1904年王宠惠与孙中山在纽约会面,帮助孙中山用英文撰写对外宣言《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呼吁支援中国革命。翌年王宠惠加入同盟会。他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与伍廷芳一样拥有英国律师资格,但一直没有外交阅历,并无外交经验。“论外交经验和工作阅历,伍廷芳确实具有优势,特别是从上海光复以后,他投身革命,从事对外交涉工作,卓有成效,如果在临时政府任外长职务,更具有连续性。”<sup>[47]</sup>代表们对孙中山的奇怪安排自然有反对意见。

黄兴也与孙中山商量:“秩庸与亮畴对调。”但孙中山坚持说:“外交问题,我欲直接,秩老长者,诸多不便,故用亮畴,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sup>[48]</sup>原来孙中山多年身居国外,与列强朝野接触广泛,自信熟悉国际事务,他身为临时大总统打算直接掌管对于临时政府至关重要的外交。面对七旬长者伍廷芳,孙中山觉得不便于随时下指示。其实伍廷芳能给孙中山做个不错的参谋、助手。

孙中山原先对伍廷芳还不信任。孙中山曾在临时大总统府对南方议和代表团秘书张竞生说:“这次南方议和代表虽是伍廷芳,但实权我已暗中令汪精卫负责。伍是我方外交部长,并且为各方所推荐,表面上是很合适的,但其人是大官僚,贪图物质享受,过去做驻美公使,声名很不好。他不是革命党人。在他任代表往上海时曾问我,这次议和,如能达到像英国一样成立内阁制度,清廷则保存虚君位,这样能否接受?——我坚决对他说,我们革命的宗旨,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断不能再由清朝保留虚君位。总之,无论从那方面看,伍是不能真正代表我们革命的宗旨的,只因各省代表推荐他,不能不任命他为代表,但我总怀疑他是否能称职?所以我们另命汪精卫、王宠惠、王正廷、钮永建等人为议和代表团参赞,暗中授汪精卫以全权。”<sup>[49]</sup>

孙中山这是误会了伍廷芳。“1911年11月至12月间在给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劻的书信中,伍廷芳阐释了由仕清到反清的演化缘由……此信的发表,不仅令清廷愕然不已,即使‘一时所谓缙绅士大夫,皆惊异之’,‘而不知公匡时救国之志,蓄之已久,故有触即发也’。”“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评价道:‘唐绍仪从一开始就已经发现,他的对手是坚决要求推翻清朝而实行共和的。’在1911年末谈判伊始时,伍廷芳便以坚定不移的口吻说道:‘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重新缔造,我意以此为确不可易。’‘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共和民主的谈判基调由此定下。”<sup>[50]</sup>伍廷芳这番话见于1911年12月20日的《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sup>[51]</sup>而此时孙中山归国尚未抵达香港。

伍廷芳、王宠惠职务对换,这种用人错位、任非所长的方案在社会上也引起非议。加上伍廷芳原先的副手温宗尧没有列入次长名单,伍廷芳、王宠惠、温宗尧同是广东人,上海的粤籍绅商反对尤甚,准备集会抗议,推举代表面见孙中山。1911年12月31日,广肇公所、潮

---

州会馆致电孙中山：“武汉起义，各省以伍、温二公中外信仰，举为外交长并议和全权代表。今新政府甫成，忽遽易人，中外疑惑。闻王君宠惠力辞外交，可否仍旧伍、温二公担任，以释群疑，而维大局，民国幸甚。”<sup>[52]</sup>原先曾认定借给临时政府40万两白银，此时扬言暂不交付，给财政上处处捉襟见肘的临时政府造成不小压力。伍廷芳、温宗尧于1912年1月4日致函广东同乡，自谦之后申明大义，大力劝解。“且满廷未覆，隐患方滋，阍墙之争，最所当戒。”“开会一事，务祈迅速取消，至认定借款，尤宜照数呈缴，以昭信用”。<sup>[53]</sup>

王宠惠也以自己“学识疏陋，未尝周旋于外交界”，<sup>[54]</sup>向孙中山递交了辞呈。“亮畴以资格不足，欲辞。先生曰：‘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也。’”<sup>[55]</sup>孙中山放着老当益壮的资深外交人才不用，勉强让毫无外交经验的年轻人上阵，还以破除官僚资格为由作辩护，可谓强辩。“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加上缺乏信任，这才是症结所在。孙中山要直接指挥外交事务，不介意身为新手的外交部总长能否胜任。

即使在同盟会内部，对这种任命持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1月上旬，湖北代表王正廷（后任南京参议院副院长）、沪军都督陈其美来电：“王君宠惠恳辞外务，中外舆论均以伍调司法为怪。廷、美为大局计，敢请仍以伍、温续任外务，调王司法。乞速定夺。”<sup>[56]</sup>浙江的同盟会及其他人士也来电：“民国初立，外交迫切。王君硕学虽甚善，然伍、温二君成绩在人耳目，不如易位。”<sup>[57]</sup>

在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之人选上，伍廷芳可谓众望所归。早先湖北、江浙率先倡议独立各省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时，1911年11月9日黎元洪致各省都督通电，表示湖北方面认为政府各部“其首长之条件，以声望素著，中外咸知，并能出而任务者为必要。”还对人选作示范性建议，认为外交可由当时各省认同的伍廷芳、温宗尧担任。<sup>[58]</sup>11月12日，雷奋、沈恩孚、姚桐豫、高尔登等江浙两省代表电请各省派代表来上海，商议组织“临时国会”，关于独立各省的临时外交代表，他们也是推举伍廷芳、温宗尧。<sup>[59]</sup>12月1日，章太炎在《民国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待论也。”<sup>[60]</sup>

1月6日，孙中山接受《大陆报》记者采访。《申报》报导说：“记者告先生，伍廷芳为司法总长，外间颇为错愕。先生谓：此不足异，外人皆以伍博士为外交之才，而自吾人视之，其律学更优于外交也。”<sup>[61]</sup>其实以伍廷芳在晚清的经历，他在外交上的建树大于司法。<sup>[62]</sup>

三年后的1915年3月，伍廷芳在一篇文章中流露了自己作为当事人当初顾全大局而不便说出的看法：民国缔造之初，“当时尝闻西人之议我者……又谓东西留学诸生，纷纷返国，竞入仕途，当道乃不加甄别之，分委以总次长之要津，或为专城之重寄，稽之各国，无此轻率用人之政体，等语。以验当时，所行政事，固无怪外人之腾笑也。”

## 四、结语

南京临时政府权力分配的实践证明，让革命党及其领袖全面掌握临时政府的权力，似乎顺理成章，有利于推进辛亥革命事业，但这只是一个认识误区，实际效果与愿望相反，反而不利于推进辛亥革命进程。南京临时政府执政效果很不如人意，有多方面原因，权力分配格局的较大缺陷应当是其中之一。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武昌起义后的辛亥革命进程是由同盟会内外的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共同推动，革命不分先后，加上政权草创，立足未稳，亟需收拾人心，此时不宜搞“政党内阁”或者其变相的“次长内阁”。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集中于同盟会，与团结容纳革命阵营内部多方力量，实际效果上二者未能统一。赵凤昌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上的主张是可取的：“建府开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sup>[63]</sup>这是古往今来初创政权的经验总结。然而孙中山等人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让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同盟会，甚至较多地集中于孙中山，使得南京临时政府权力分配失衡，某种程度排斥了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甚至于革命党人中的不同派别者，损害了这些力量的政治热情，不利于多派革命力量齐心协力。不真正重视团结，不注重群策群力、人尽其才，结果差不多像章太

---

炎所说：“以一党组织政府”，导致“人心解体矣。”<sup>[64]</sup>

况且，在此革命政权初建的新旧交替之际，同盟会的执政能力一时尚不具备，要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全面掌权并不现实，难以掌控局势，容易造成失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都缺少从事政府事务尤其是理财的实践经验，这是其长期在海外、在晚清政府体制外从事革命活动而形成的先天不足。赵凤昌之子赵尊岳中肯地说：“党人赤诚革命，躬冒百险，不折不挠，毅勇信非恒流所可及。然蹈厉有余，治术不足，亦为无可讳言之事。”<sup>[65]</sup>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革命阵营者不缺乏原先在晚清政府体制内从事政务和理财所积累的实际经验，并且还都有一定的社会声望。黄兴作为同盟会里面长期负责实际事务的重要领导人，也自知执政能力比之不足。“克强以三月廿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名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sup>[66]</sup>

无庸讳言，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前后，革命阵营内各派力量都力图在临时政府中拥有很大的领导权或者影响力，武昌起义后上海方面与武昌方面关于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争就是证明。同盟会、孙中山在临时政府中掌握重要领导权当然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集权，而关键是要能够凭着真才实干，审时度势，拿出正确、高明的政治主张来影响革命阵营内部其他力量。正如宋教仁后来阐述的：“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sup>[67]</sup>但同盟会、孙中山在临时政府中执政时，在多方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中并没有拿出多少正确、高明的政治主张。这样即便实行“次长内阁”，仍未摆脱被动局面。南京临时政府权力分配存在较大缺陷，责任并非全在于孙中山一人，因为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同盟会领导层和各省代表会都有着一定的决定权，对于孙中山有着一定的制约。南京临时政府本是个过渡政府，其凝聚力、号召力和执政效果不佳，使临时政府更为势单力孤。

#### 注：

[1][8]m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16、305 页。

[2]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全一卷《中华民国的创立》（下），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430 页。

[3] 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 页。

[4][28] 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2—403、403 页。

[5][31] 张宪文、薛恒等：《共和肇始：南京临时政府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9—171、170 页。

[6] 吴佩林、董清平：《王宠惠何以担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史学月刊》2014 年第 10 期。

[7] 刘宝东：《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组阁风波》，《文史天地》2009 年第 3 期。

[9][50] 张礼恒：《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10][17][19][22][45][55][66]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1981 年第 2 期（总 45 号）。

- 
- [11] 王有兰：《迎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尚明轩、王学庄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79—780 页。
- [12] 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0 页。
- [13][14][40][48] 居正：《辛亥札记》，陈三井、居蜜编：《居正先生全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8 年版，第 79、79、79—80、79—80 页。
- [15][18][21][26] 居正：《梅川日记》，陈三井、居蜜编：《居正先生全集》（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8 年版，第 183、183、183、183 页。
- [16] 孙中山：《致陈其美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7 页。
- [20] 蔡元培：《自写年谱》，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05 页。
- [23] 张謇：《致赵凤昌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 2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9 页。
- [24]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 8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32 页。
- [25] 张謇：《复马君武函》，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 2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5 页。
- [27][29][33][36][60][64]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70、370、370、367、363、367 页。
- [30] 张继：《回忆录》，转引自李守孔《民初之国会》，（台北）正中书局 1977 年版，第 45 页。
- [32]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9 年版，第 7 页。
- [34]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3 页。
- [35] 万鸿喆：《民社成立与黎袁勾结》，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7 页。
- [37] 张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 期。
- [38][41][43] 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0—121、127、125 页。
- [3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78 页。

- 
- [42]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572 页。
- [44][46]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版，第 183、183 页。
- [47] 丁贤俊、喻作凤：《伍廷芳评传》，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1 页。
- [49] 黄任潮：《张竞生谈孙中山对南北议和的指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13 页。
- [51] 《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90 页。
- [52] 《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致孙中山电》，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423 页。
- [53] 《致广东同乡函》，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423 页。
- [54] 王宠惠：《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王宠惠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年版，第 631 页。
- [56][57] 刘云黛、赵金敏辑：《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所收电文（七十三通）》，《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 年第 3 期。
- [58] 《黎元洪为请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致各省都督通电》，《民立报》1911 年 12 月 2 日。
- [59] 《江浙两省代表雷奋等致各省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063 页。
- [61]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621 页。
- [62] 《中华民国图治刍议》，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649 页。
- [63][65]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1983 年第 3 期（总 53 号）。
- [67] 宋教仁：《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56 页。